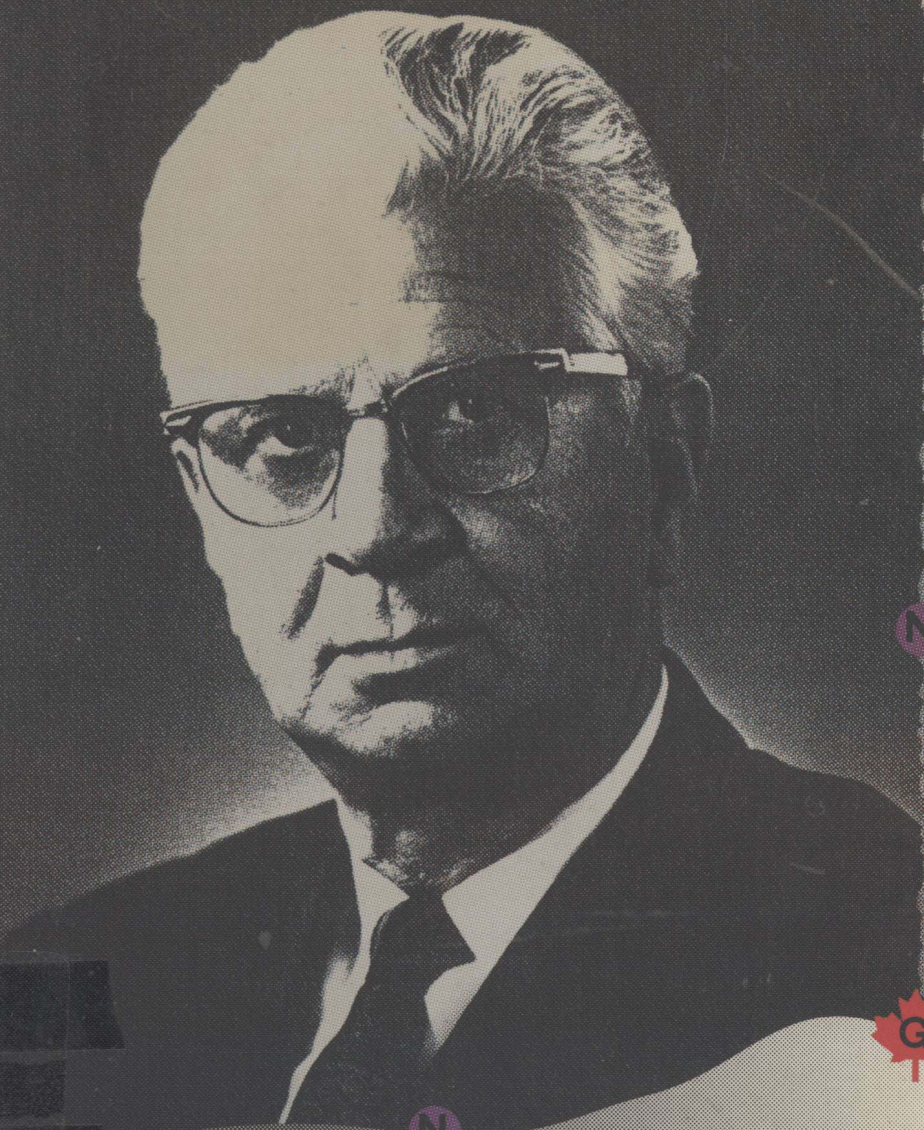




朗宁传

朗 宁 传

刘广太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朗 宁 传
刘广太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5 印张 259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 定价:20.30 元

ISBN 7-5434-3334-6/G · 253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架起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阿瑟·孟西斯*

1945—1951年，加拿大驻华使馆自重庆和南京向国内报告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过程中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期间，切斯特·朗宁任职使馆，身系重任。在其后二十年中，他继续在亚洲问题上为加拿大政府出谋划策。

清朝末年，作为路德教传教士的儿子，朗宁在湖北樊城生活了十二年；1922—1927年，他又在樊城鸿文中学当了五年校长，这使他在社会巨变时期对中国人民十分了解和同情。由于这一背景和他那流利的汉语，朗宁于1945年抗日战争结

* 孟西斯 (Arthur Menzies)，汉名明明德，1916年出生于中国河南安阳。1946—1950年任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1976—1980年任加拿大驻华大使。



束后在重庆及其后在南京加拿大大使馆任一等秘书时对加拿大政府的部长和高级官员裨益甚广，有助于他们了解、对待这一时期中国的变革；他作为临时代办滞留南京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加拿大关闭驻华使馆时才离开。

在重庆和南京期间，朗宁先生经常以译员兼顾问的身份陪同加拿大大使会见国民党政府要员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周恩来、董必武、黄华以及其他于1949年10月1日以后在国际场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的故交，使得作为加拿大代表团代理团长的朗宁在1954年关于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和1961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充当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联络员角色。其作用在会议之外更形突出，朗宁口操湖北方言，侃侃而谈，随和得体，颇使中国朋友高兴，从而造成一种轻松的气氛，非正式地讨论一些问题。

1951年离开中国回到渥太华后，朗宁被任命为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1954年出任驻挪威大使，那里是他的祖籍所在。1957年被任命为驻印度高级专员（对驻英联邦国家大使的称呼）。1954年日内瓦会议设立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国际监督委员会，印度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加拿大



和波兰是另外两个成员国。朗宁多次同印度外交部高级官员乃至尼赫鲁总理讨论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形势发展变化。

1961年从外交界退休后，朗宁几度应加拿大政府之聘返任，专门负责涉及加拿大同亚洲的关系事务。加拿大总理和外长深知，朗宁个人相信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业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认为，朗宁的同情心将有助于在亚洲的革命领导人同西方领导人之间架起交往的桥梁。

1949—1970年间加拿大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外交关系。朗宁不遗余力地呼吁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他指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通过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加入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1970年10月加拿大政府终于同中国达成协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朗宁甚感欣慰。稍后，他作为周恩来总理的贵宾访问中国，于1971年5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总理接见。

朗宁供职外交部期间，我们是同事和好友。1945—1951年他在中国时，我任司长的远东司收



转处理他发回的报告并发指示给他。他长我 22 岁，就尊称他老大哥，他则叫我“小天宝”，因为我比他矮得多，是个小胖子。他一口湖北腔，而我因生于安阳一个传教士家庭则说河南话。

对朗宁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革命的各个阶段的分析，我并不一味赞同。但对他坚信自己的结论这一点却非常佩服。高兴的是，加拿大外交部鼓励它的属员对外交问题提出自己中肯的分析。当加拿大政府对问题的各个方面加以斟酌并作出决定之后，就要求全体官员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

我很高兴刘广太教授在加拿大和中国对我的好友切斯特·朗宁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坚信他写的传记将有益于人们认识一位竭力促进中加两国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使者。

1996 年 7 月 4 日，渥太华

(张大勇译)



切斯特·朗宁

布赖恩·埃文斯*

切斯特·阿尔文·朗宁是一位杰出的人物。由于其上辈同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渊源，他曾生活于这三个国家中，且熟知它们，有他这种经历的人为数甚少。作为一个天才的教师、政治家和外交家，朗宁晓谕人们理解复杂问题，从不停辍。

我和切斯特·朗宁相识是在六十年代，那时，他已经告别官方外交生涯，回到阿尔伯达的卡姆罗斯过宁静的退休生活。但是，他不可能悄然无闻地呆下去，退休后还被加拿大政府抓差。他两次奉命出使河内，竭力改变美国对越南统一事业

* 埃文斯 (Brian L. Evans) 博士为加拿大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73—1974 年曾任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1996 年秋自阿尔伯达大学历史系退休。

的侵犯。结果，一事无成。

在中国问题上，朗宁是个著名的鼓吹者，他疾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进入联合国。他坚定地支持承认中国。当中国和加拿大于1970年就相互承认达成协议时，没有人更比朗宁高兴了。他为此等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朗宁一直为使中国得以承认不懈地努力。

切斯特·朗宁在学生们身上花费时间很是慷慨。他应邀为我的好几届学生讲过课。他还参与母校阿尔伯达大学董事会的工作。当然，他还经常被请到卡姆罗斯的路德学院（今奥格斯坦那大学）给学生们讲课，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曾任该校校长。

在我看来，切斯特·朗宁简直是个中国人。他的第一本能是操一口家乡方言，喜同中国伙伴交往，许多中国人听到一个外国人能说这么一种方言感到惊讶。后来，朗宁去世后，我曾到过他的出生地，我知道了他为什么对那里有如此深厚的、念念不忘的感情。

朗宁在中加关系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对中国革命、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建国时的环境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对加拿大领导人提出的建议



就易于被接受。在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在出席联合国会议时以及在驻印度高级专员任上，朗宁都是一个关键人物。

切斯特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真正伟人。加拿大人和我们的中国朋友均得益于他，欣慰地共享他的成就。这些成就在刘广太教授的书中得以深入讨论。刘教授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对切斯特·朗宁和中加关系颇有了解。他在加拿大对一些原始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访问过许多人。对那些想了解加中关系真相的每一位中国人和加拿大人来说，刘广太教授的这本书值得一读。我应邀为此书作序也感到十分高兴。

1997年春，埃德蒙顿

(张大勇译)



目 录

序

架起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阿瑟·孟西斯 1

切斯特·朗宁 布赖恩·埃文斯 5

引子 A·R·托平 张大勇 译 1

第一章 少小离家(1894—1907) 13

第二章 牛仔生涯(1907—1921) 45

第三章 汉江汹涌(1922—1927)	101
第四章 校长议员(1927—1945)	122
第五章 首途重庆(1945—1946)	161
第六章 钟山风雨(1947—1949)	189
第七章 天翻地覆(1949)	216
第八章 紫金山下(1949—1950)	242
第九章 告别南京(1951)	281
第十章 魂牵梦萦(1951—1965)	302
第十一章 如愿以偿(1966—1970)	336
第十二章 乡音未改(1971—1984)	359
后记	393
切斯特·朗宁生平年表	403
主要参考资料	410



引 子

奥德丽·朗宁·托平^① 作
张 大 勇 译

三 个 愿 望

“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向九十高龄的老爸提出这

^① 奥德丽·托平，美国《纽约时报》自由撰稿人，系朗宁三女，现居美国纽约州。



个问题。

“参与生活！”他满怀激情地说。

确实如此，切斯特·A·朗宁全身心投入生活。

我的父亲是这样地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就在他1984年去见先辈不久之前还要他的六个孩子和他一起回他的出生地看看。他的父母曾在那里传教，他的母亲年仅36岁就死在那里，留下具有献身精神的丈夫和七个儿女，切斯特为第二个儿子。

那次旅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一次。这件事是在加拿大卡姆斯罗市我儿时家中的起居室里提起来的。自从母亲英格·哈蒂·朗宁15年前去世之后，切斯特独自一人住在那里。

我们得知父亲生病后，姐姐塞尔维亚、“妹妹”^①、妹妹凯林和我，还有哥哥阿尔顿、弟弟哈蒙都从各自远在外地的家中来看望父亲，看他是否真的像过去看上去那样强壮。我们围坐在熟悉的起居室里，周围摆满了珍贵的中国古玩，那都是父亲搜集的。这时，父亲提出要我们到中国朝拜一趟，我们都惊呆了。父亲说，临终前他有三个愿望。第一，去湖北省的樊城敬祭母坟，他就出生在那里。第二，看看敦煌古寺窟。第三，长途跋涉到长城西端看看天下牢不可破的嘉峪关。二十年代，父母曾骑驴去观赏过长城。

这几个愿望可都不是容易实现的。我们也都迷恋父亲

① 朗宁次女的中国名字。



说的这几个地方，可怀疑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如此艰难跋涉。几个月前，他曾经闹过一次轻微中风，记忆力正在消退。但是，随着他热情的沸腾，我们的激情也升华了。“好吧，我们都去。”我说，“全家都去！我们可以在父亲的出生地庆祝他九十岁生日！”

爸爸的眼睛迸发出昔日的光辉。“正中我意！”他说道。接着，他站起身来，把银白色的拐杖举起来向上一划，大声说道：“开步——走！”随后，我们将在中国随处都能听到他喊这句话。

我们不顾医生的劝告，准备这次远征。姑母维多利亚是个退休护士。她告诫我们说，“切斯特很可能要死在中国的。”

我们发慌了，几个人大眼瞪小眼。“在卡姆斯罗斯他也可能会死的，”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让他高高兴兴地去死呢？”

但是，我们诚惶诚恐的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多余的。到头来，我们发现这次朝觐非常成功，我愿把它介绍给世界各地打算和年迈的父母一起做最后远征的成年儿女和朋友们。

土 包 子

我们终于到了爸爸的出生地樊城。大雨过后街上泥泞，但爸爸还是坚持清晨散步。一个我们从未见过面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上前搀扶父亲，用汉语说：“老先生，我帮

您一把。”父亲用汉语对她的乐于助人表示感谢，并彬彬有礼地问她高寿。

“我周岁七十五了，”她说，“您多大年纪了？”“周岁八十九。”父亲答道。

她停下来，仔细地瞅着他。父亲六英尺二寸的个子，一头茂密的白发。“您的中国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她问道。“因为我是中国人呀！我就出生在这个城里，就是这里。”他说着，用拐杖点点地面。

“是吗？”她盯着他那双蓝眼睛说，“那您怎么长得不像中国人呢？”

“噢！您看，”他悄悄地说，“我在加拿大住了这么长时间，就长得像他们了。”

她咯咯地大笑起来。“啊呀，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她说着，拍打着父亲的手臂，不住地对众人重复着刚才同父亲的对话。好奇的旁观者越来越多，他们都来看这些从大洋彼岸来这里给祖先上坟并为他们的父亲过九十岁生日的高个儿、大鼻子的一家人。

“他倒像个外国人，”一个人说道，“但更像个土包子。”当地人开玩笑时常用这个词儿。

“不错，”父亲说，“我真是老土包子，和你们一样。”他们都开心地笑了，祝父亲一路顺风。谢过他们，爸爸举起拐杖，喊道：“开步——走！”。他迈开大步。几个月来我们还没见他走得这么快、步伐这么轻盈。他的孩子们，还有越聚越多的友好的中国人跟在他后边。

从阿尔伯达那个起居室里开始的三周中国之行的另外



一天也是令人难忘的。我的父亲和母亲于 1966 年回到卡姆罗斯市。那是在外奔波一生之后：在中国度过传教士孩子的童年；在加拿大作牛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飞行员；襄樊鸿文中学校长；卡姆罗斯路德学院院长；阿尔伯达省议会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皇家空军情报中队长。战后，爸爸进入外交界，作为派往中国的外交官到了重庆和南京。七年后，爸爸回到加拿大任外交部美洲和远东司司长。后来，又出任驻挪威和冰岛大使以及驻印度和尼泊尔高级专员。退休后，他和妈妈在卡姆罗斯一起参加绘画班学习。

经过十七个小时的飞行到了北京，爸爸的神态比我们其他人都好。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平常，这时应该是他入睡的时刻，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晚上很难入睡。一位老朋友来接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明天中午王炳南（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你们。”一辆红旗大轿车和几辆小轿车在等我们，把我们送到一个宾馆。国民党总统蒋介石曾在这里住过。

次日，爸爸又使我们惊讶一番。我们都有时差反应，而他却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在宴会上，他一见面就认出了王炳南，尽管他们上次见面是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已时隔二十三年了。爸爸虽然常为一个英文词卡住而冥思苦想，可说起汉语来还是那么流畅，那是他的第一语言。他们回忆起 1945 年第一次见面时的详细场景，那是在遭受战争破坏的重庆。

“你再次回中国来我们感到很荣幸！”王炳南对爸爸